

专业化产业区建设与农村城市化进程

◎ 傅允生

〔摘要〕 专业化产业区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与农村城市化的有效载体。在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专业化产业区不但奠定了它的经济基础,而且与乡镇结合通过产业与人口集聚以及功能转换有效地实现了乡镇向城镇的转型。

〔关键词〕 专业化产业区 农村城市化 产业集聚 人口集聚 乡镇发展

〔作者简介〕 傅允生,浙江财经学院投资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 杭州,310012。

〔中图分类号〕 F061.5;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4) 01-0085-05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及经济发展中的难点。中国人口众多,13 亿人口有 9 亿在农村,如果不尽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农业比较收益,那么,在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就很难实现。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加快工业化步伐,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从实践看,加快专业化产业区建设是推动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的成功之路。

一、专业化产业区建设与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专业化产业区在国外文献中通常称为产业区 (Industrial Districts),或产业群 (Industrial Cluster)。意大利学者贝卡蒂尼 (Becattini, 1991) 将产业区定义为以同业工人及其企业簇群在特定地域内大规模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特征的地域性社会实体。巴格拉等 (Bagella et al., 2000) 认为产业区是存在着投入产出关系,并受共同的社会

规范约束相互之间充满正负两种溢出的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形成的企业网络。专业化产业区实践,较早与较为典型的是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在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 7 个省的所谓“第三意大利”经验。

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年来,由于专业化产业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重要,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历程及其特点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广东东莞为代表的主要由外商投资启动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电子与家电加工产业区。其二是以浙江省为典型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专业化产业区。前者是从国外移植而来,故被称为“嵌入式”专业化产业区;后者是受工商业传统影响,由民间自发创业形成的,因而被视为“原生型”专业化产业区 (金祥荣等, 2002)。这种认识较为准确地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化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不同缘由、路径与特

色。综观国内外专业化产业区的实践,它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效十分明显。

从浙江的情况看,农村工业化是以专业化产业区为主要载体的,因而,大力培育专业化产业区形成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基础,成为浙江农村城市化的中心环节。考察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可见,它是广大农民在地方工商业传统影响下,自谋出路、自筹资金、自找项目、由小到大、由散到聚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自发性与民间性特征。同时,地方政府对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例如,绍兴轻纺交易市场就是由县工商局牵头组建,为了培育市场,地方政府在税收、信贷与工商管理等多方面予以扶持,这无疑为专业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专业市场是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信息收集、商品交易、地区品牌塑造等多重功能,对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带动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对专业市场的扶持推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可以说,自发性与民间性反映了专业化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的扶持则体现了外在助力。正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助力的结合,亦即农民创业积极性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责任心所形成的合力,使专业化产业区得以形成并且快速发展。专业化产业区具有以创新能力与协同机制为主要特征的内在发展动力,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已作了充分论证,兹不赘述。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由点到面的扩展过程。温州的低压电器、绍兴的轻纺等是形成较早规模较大的产业区,在它们良好发展态势的示范作用带动下,专业化产业区在全省各地相继兴起。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加强了对专业化产业区建设指导与扶持的力度。诸如,建立了绍兴轻纺、永康五金、温岭泵业等多家面向专业化产业区的技术服务中心,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技术含量与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利用财政贴息支持中小企业更新设备、加快技术改造等等。经过多年努力,浙江形成了绍兴轻纺、海宁皮革、乐清电器、永康五金、嵊州领带等产值超 10

亿元的专业化产业区 20 多个,总产值达 4300 余亿元。一批县(市)通过专业化产业区建设成为国内生产总值超百亿的强县(市)。可见,正是重视对专业化产业区的培育以及它在全省各地的兴起,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形成了农村城市化的雄厚经济基础。

二、专业化产业区建设与农村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浙江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农村城市化在专业化产业区迅猛发展的有力推动下,其广度、深度与进度都呈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在专业化产业区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浙江农村城市化正沿着以中小企业集群为基础以乡镇为依托的城镇化模式发展。

(一) 专业化产业区引导与加快产业集聚

农村城市化离不开产业集聚,就其过程而言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乡镇工业的出现与发展,二是企业由离散转向集聚。专业化产业区的聚合功能与扩展效应使它在产业集聚的速度与规模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从浙江的情况看,专业化产业区作为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途径与产业集聚的有效载体,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但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创业由于受自身条件与“离土不离乡”政策的限制所造成的地域上的离散状况,而且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既促进了中小企业成长,又为新企业创办与企业群落的衍生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产业集聚的速度和规模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以绍兴轻纺专业化产业区为例,在专业化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专业市场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市场信息与高效的商品交易平台。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市场供求状况,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产供销问题。因而,原先散处各地的中小企业为了减轻交易成本,适应市场变化,提高经济绩效,纷纷向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地域集聚。企业由离散转向集聚对产业区发展来说,不仅仅是企业数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了地方企业网络与专业化分工,亦即中小企业集

群使新的产业组织及其机制得以形成。

这种新的产业组织是以中小企业地域性集群为基础的产供销联合体。从结构上讲,它是制造业群体与商贸业群体相关联的开放式复合结构。如绍兴轻纺专业化产业区除了从事织造、印染等制造企业外,由众多商家参与的轻纺交易市场成为与之对应的商贸业群体。当然,制造业与商贸业并非截然分开,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利用专业市场的销售优势设立商贸公司,实行产供销一体化发展。从总体上讲,制造业群体与商贸业群体双向互动,既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又促进了专业市场的繁荣。从功能上看,专业化产业区具有“通过集聚效应产生外部经济,通过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通过产业文化有利于技术创新与扩散”(魏守华,2002)等效能,这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同时,企业集群所带来的创业氛围、学习环境、要素供给便利和地区品牌等因素,有利于新企业的创办与企业群落的衍生,从而加快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规模扩张。

实践证明,企业集群所带来的协同效应、合作效率和创新效能不仅诱致分散的企业相互聚合,而且能够加快中小企业的成长和新企业的创办以及产业链的扩展,从而扩大产业群的规模。加之,专业化产业区的产销一体与工贸互动机制,在有效地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绍兴轻纺专业化产业区考察,与之相关的储运、食宿、电信、金融等都得到快速发展。因而,专业化产业区在产业集聚上除了速度与规模的效应外,还呈现出产业的结构拓展,即产业集聚从单向度发展走向多维度拓展,形成融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地方产业体系。在浙江这种地方产业体系常常以“城”,诸如绍兴轻纺城、永康五金城来命名。它反映了专业化产业区在产业集聚上所具有的快速性规模性和综合性特征,这种产业集聚的方式对地方经济发展来说是高效的,对农村城市化来说是相融的。因为这种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不只是形成某种类型的工业区,而是以工业为主导,工业、贸易与服务互动的地方经济体,在产业集聚功能中蕴蓄着城市化的内容。或者说,工业化过程不

啻是为城市化创造条件,而是与城市化互为一体。不妨说,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农村城市化同生共进的。

(二) 专业化产业区推动人口汇聚与乡镇发展

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两者的内在关联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一方面推动了城市本身的发展,包括城市的结构、功能如何发展以适应工业化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将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城市规模与人口数量得到进一步扩大。

从新中国建立后城市化的发展路径看,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是以城市工业发展实现对城市就业人口及少量农村转移劳力的吸纳为主导的。由于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的双重壁垒,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而且起伏不定。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是以农村工业化实现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为主导的。这期间,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使城市的国有与集体经济由于面临改制而无法有效扩大生产规模以吸纳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它冲破了城乡产业分割的壁垒,大量乡镇企业应运而生。这导致乡镇企业游离城市而且在地域上呈离散分布,同时,乡镇企业的职工仍然保留着农民的户籍身份,不少人仍然亦工亦农。这种农村工业化道路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与变异性,这不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亦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融合趋势产生一定程度的背离。由于中国户籍制度,或说城乡分割体制一时难以破除,同时,又受工业化进程中产业集聚内在要求的驱动,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渐走上与乡镇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乡镇历来是城市与农村的连接点,它是乡镇政府所在地,有少量居民以及一些为当地农村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尽管乡镇在形式上与城镇相似,但是它的政治与经济功能是与辖区的农村联系在一起。乡镇与农村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契合,是基于乡镇的初级城市功能有利于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小企业集群所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能够推动乡镇人口的汇聚与城镇的发展。

就人口汇聚而言,由于产业集聚需要大量产

业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来自当地农民和一部分外来务工者，尽管这些人的身份依然是农村户籍，但是他们实质上已转化为产业工人。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这些人的工作性质与身份相统一的问题是迟早会解决的。同时，专业化产业区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对劳动力吸纳的量相对较大，从吸收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扩大乡镇人口的角度讲，是比较有利的。此外，由产业集聚所带动的第三产业发展拓展了乡镇的功能，改善了乡镇生产与生活的条件，吸引更多农民到乡镇寻找就业的机会与安家落户，从而使乡镇人口汇聚的速度与规模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

就乡镇发展来说，随着产业集聚、人口汇聚与乡镇规模的扩张，与之相应的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机构设置势必同步推进。当然，这种客观需要的实现必须以相应的财力作为保障。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使地方政府有财力支持乡镇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机构的扩充；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与人口汇聚所带来的商机，吸引一些企业以商业化的形式对乡镇进行开发建设。由于财政投入与商业化开发为乡镇建设提供了必需的资金，与此同时，产业集聚与乡镇的商业化开发又拓展了乡镇的经济功能，从而使乡镇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与支农服务的定位转向以工商业活动为主的中心城镇发展。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路径是小城镇发展模式，产业集聚、人口汇聚与乡镇发展是它的必要条件。从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实践考察，专业化产业区所具有的产业集聚与人口汇聚功能使乡镇城镇化成为可能。诸如绍兴柯桥镇在轻纺专业化产业区发展的推动下，已从昔日的小镇变为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工商业城市。由此可见，专业化产业区虽然不能说是产业与人口集聚的唯一机制，但是，它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之成为推动农村城市化的有效载体和成功之路。

三、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中国农村城市化问题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

期就提出来了，1983 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的观点，这一主张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并且被政府采纳而成为农村城市化的主要途径。经过 20 年建设小城镇模式已取得一定进展，同时，对农村城市化的认识也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如前所述，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以及相应约束条件下的路径选择。从一般意义上讲，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动力。城市化不仅要扩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更要注重规模效应。前者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就业岗位的变更使更多的农民转化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市民；后者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产业与人口的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因此，我们评价小城镇发展模式成功与否，最主要的不在于有多少农民转化为市民，而在于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并且能够通过产业与人口的集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进程。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实践来看，城市化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必须具有规模效应。根据世界银行《1984 年世界发展报告》总结，城市只有达到不少于 15 万人口的规模，才能产生集聚效应，而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其集聚效应逐渐递增。城市化的这一特点，可以说对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小城镇通过何种途径与方式有效地实现产业与人口集聚，而且具有规模效应。二是在县域经济范围内是否有必要与可能普遍推行乡镇城镇化。

从浙江农村城市化的实践看，通过专业化产业区建设促进产业与人口集聚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并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是可行的成功的。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主要得益于专业化产业区在全省各地的兴起。由此可见，农村城市化与小城镇的发展其重点不在于如何放松户籍管制，而在于尽快形成产业与人口集聚的机制。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城市化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村城市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加之户籍制度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把主要精力

放在以户籍制度改革带动农村城市化,无异于舍本求末。事实上,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城乡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差异化,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公共福利供给才有可能。同时,受城市化规模效应的制约,众多乡镇齐头并进推行小城镇化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产业与人口集聚以及规模效应,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况且,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即使具备形成若干个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的经济条件,也不如集中力量建成与发展1至2个中心城镇。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集聚功能与规模效应,保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城市化的更快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总体上工业对城市化的贡献率正在逐渐衰减。与之相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第三产业在扩大劳动就业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就业结构升级应该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郭克莎,2002)。从发展趋势上讲,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面临巨大发展机遇以及中国目前所具备

的比较优势看,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对农村城市化的推动在一定时期内依然是强劲的。因而,专业化产业区建设在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专业化产业区与乡镇结合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郭克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武力:《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李永刚:《城市化与乡镇企业空间聚集进程相关性研究》,《财经论丛》2001年第6期。

周叔莲、郭克莎:《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金祥荣、朱希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

傅允生:《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财经论丛》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